

恂恂儒者，不知老之將至

——歲暮憶湯公

● 陳方正

初識湯一介先生，根據他自己的回憶，是1985年5月他到香港中文大學來參加兩岸三地「鬥爭與和諧哲學討論會」。那時他和夫人樂黛雲南下，在新成立的深圳大學創辦國學研究所。記得曾經應邀去拜訪他們，嶄新的房舍還帶着濃厚油漆氣味。此後不久我離開大學秘書處，轉到中國文化研究所任職，彼此不時有來往。如今在陳舊的隨身記事簿裏，還可以找到1987年8月中，在香港麗晶酒店和他約會的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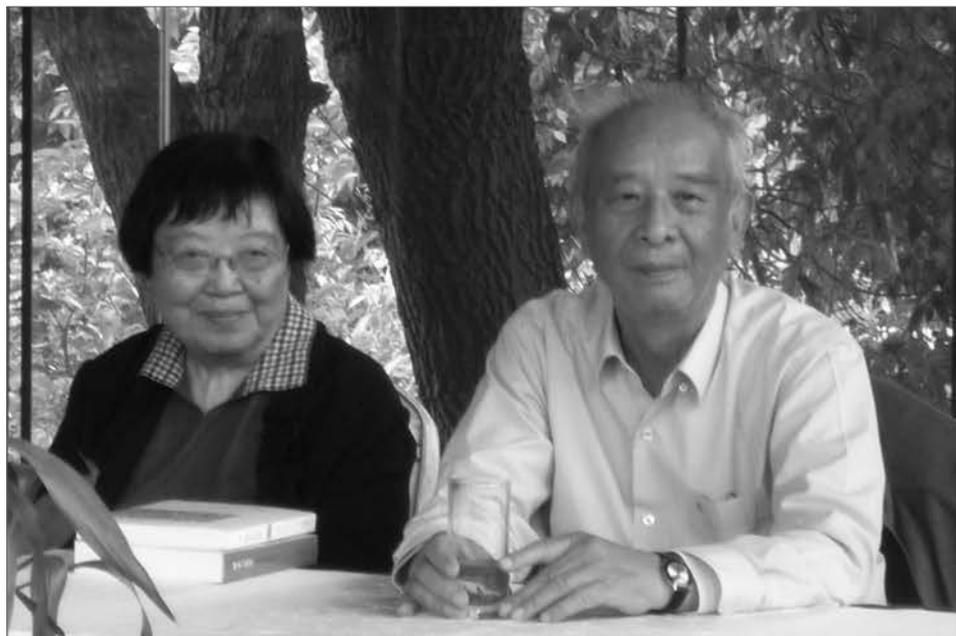
同年深秋，湯公等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為慶祝梁漱溟先生大壽和開展學術活動七十年召開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在北京二七劇場舉行，討論會則移師香山飯店。我躬逢其盛，見到多位學界前輩如費孝通、周谷城、張岱年、季羨林、任繼愈等，更有機會數度在大會上發言，是為參加文化書院活動之始。這趟有好些海外學者與會，像趙令揚、霍韜晦、李弘祺和我來自香港，吳德耀來自新加坡，周策縱、林毓生來自美國，此外還有兩位日本學者，想來大都是湯公在改革開放後不時出國，從而認識和邀請的吧。當時感覺此會辦得十分體面、熱鬧，更為香山飯店的氣派、優雅傾倒——後花園那兩棵大銀杏樹，在10月下旬初雪中特別顯得雍容秀挺。日後回味，才注意到此會在組織和氣氛上，是多麼的開放、多元、包容，即使相當尖銳的對立意見，包括對梁漱溟學說的批評，都可以在和諧、輕鬆氣氛中各自發揮，相互碰撞，雖然未必產生多少具體成果，卻為學術路向的醞釀、反思，為國內外學者的交流、相聚，提供了難得機會。

跟着下來，是難忘的1989年西山臥佛寺之會，那是為慶祝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而召開，名義上由中國文化書院、「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以及香港大學中文系等四個京港學術單位共同召開，實際上是文化書院擔綱和安排一切。這趟聚會場地比前樸素簡易，也沒有年高德劭的元老參加，但與會者達一百四十多人，海外來客也二三十人，發言十分

踴躍——不過，緊張時局猶如烏雲蓋頂，所以氣氛沉悶低迷。會議結束後，許多人轉到城裏，參加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同一性質國際會議。跟着，湯公約了好些熟人到他家晚飯，夫人樂黛雲做了一桌好菜款待。把酒言歡之餘，大家不免七嘴八舌，議論時局，當時人人樂觀，甚至有點幼稚，只有孫公長江經驗豐富，頭腦清醒，說出令人愕然的中肯看法。

那場大悲劇不久就如暴風疾雨般來臨，在其中文化書院如何內部分裂，如何被盜竊財產公章，以致瀕臨滅頂之災，湯公又如何挺身而出，與其他院內中堅份子力挽狂瀾，都非我所知，待事過情遷之後，方才從陳越光兄那裏隱隱約約聽到一二。此後大陸學者和外界頓形隔絕，但湯公和文化書院所受影響似乎是最小的。1991年2月，夏威夷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對中國和中國文化前途有十分熱烈的討論，湯公是唯一從大陸飛去出席的；1993和1994年文化書院分別在北京和杭州舉辦研討會，前者以「中西印文化融合與發展」為題，後者以「中國文化的回顧與展望」為題，我都參加而且講了話，氣氛一如既往，仍然相當輕鬆開放。這樣，文化書院的一項重要功能，即為海內外學者文人提供相聚談論機會，就恢復過來了。像龐樸、朱維錚、孫長江、劉夢溪、袁偉時、杜維明、陳來、王守常、陳越光等一班朋友，都是那期間相熟起來的。

此後十來年間，我每年總要為了各種原因上京兩三趟，每趟都要找機會和湯公兩口子以及他周圍的相熟朋友相聚，相告傳聞，議論時事，臧否人物，過一個暢快的晚上。這些場合多半是越光作東，維錚痛飲，長江傾談往事秘聞，湯公則恂恂儒雅，微笑傾聽，偶爾不溫不火地講幾句看法，有時聲音高亢一些，但慷慨激昂，拍案而起則絕無僅有。至於學術會議文化書院也



湯一介與夫人樂黛雲在中國文化書院為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舉辦的「唐廊雅聚」上，攝於2009年。（圖片由陳方正提供）

繼續召開，但似乎不像以前那麼頻密了。記憶中我參加的只有兩三趟，包括1999年5月的大覺寺之會。那是繼北京大學召開「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討論會之後的春遊雅聚，雖然有個座談，讓大家對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抒發感想（季羨林老先生開頭，也講了很不少話），其實還是以徜徉山水，品茗閒談，享受明媚春光為主。當然，此番與當年臥佛寺之會的海外朋友如周策縱、舒衡哲（Vera Schwarcz）等十年重逢，就不勝感慨了。此會安排和以前大不一樣，予人以拈花微笑，頓然開悟，忘卻諸般煩惱的味道。看來，應該也是出自湯公的構思吧？

湯公為人忠厚平和，胸襟寬廣，我是個半路出家，闖進文化圈來的後輩，不諳人情世故，研究領域也迥異，他卻一直很照顧，經常邀我參加聚會，提供許多發言機會，還兩趟特別為我安排演講，令我衷心感激。1997年春間文化書院剛裝修好一處四合院，那是北大撥給書院作為固定辦公和聚會場所的，我此時恰好對科學史發生興趣，有些心得，於是湯公讓我到這小院做了個演講。我的主題是天文學經典《大匯編》（*Almagest*）的源流，主旨則是現代科學並非如許多人所想，是起於文藝復興，而是出於一個極為久遠的傳統。這對聽眾造成頗大衝擊，但反應不一，老輩哲學家張世英也來聽講，對此看法特別認同。這是我在北京作專題演講之始，講稿後來發表在樂黛雲創辦的《跨文化對話》上。

2002年夏天我退休，湯公聞訊，又客氣邀請我在那年11月主講第五屆「蔡元培學術講座」和第六屆「湯用彤學術講座」，那是文化書院和北大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合辦的，由北大校方發邀函。這自然是很高榮譽，我受寵若驚，用心準備了「在正統與異端以外——科學哲學往何處去」以及「在自由與平等以外——21世紀社會建構的探索」這兩個題目應命。記得聽眾很不少，討論也頗熱烈，事後湯公為我將這兩篇講稿連同其他有關論文編成集子，交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此番演講有意想不到收穫，那就是在北大勺園住了整整十天，得以從容漫步於曲折幽深的校園，領略晨昏夕照，深秋蕭瑟意境，留下美妙難忘記憶。不過，很可惜，此後北大迅猛發展，校園逐漸為高樓廣廈佔據，如今花木凋零，無復當年清幽勝景，徒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之嘆。

到了2004年，湯公年近八十，猶壯心不已，向國家申請並獲批巨款，開動編纂《儒藏》的龐大計劃，此後思慮精力轉向此方，再無餘暇顧及文化書院的活動了——其實，後來我側聞，社團法有規定：年逾古稀即須卸任院長和法人代表，所以他此後轉以「創院院長」名義參與決策，書院事務則交由王守常兄負責。當時湯公曾邀請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參與《儒藏》工作，但我已退休，所裏也沒有適合人選可以推薦，所以只好敬謝不敏，辜負了他的好意。兩年後文化書院在遼寧桓仁舉辦「易學論壇」，我雖然完全外行，也濫竽充數參加——主要是為了參觀中朝邊境上的那個朝鮮族古代發源地而已。此後四五年間我仍然經常到北京，每趟都要和湯公見面，但就再沒有怎樣參加書

院活動了，至於我自己的工作，則完全轉到西方科學史的研究上，有點忙不過來，直到有關專著出版才鬆一口氣。2011年我再到北大，為生命科學院的研究生講物理課。那同樣是深秋，前後更逗留三個星期之久。這趟下榻校外新建的「中關新園」，那裏高廈廣宇，舒適寬敞，設備齊全，卻少了人氣和園林之勝，並無情趣可言。此行湯公說要覓機相聚，但總沒有動靜，我想他事忙或者疲累，不敢貿然打擾。到臨走那天，他們兩口子堅持要到賓館的咖啡廳來共進早餐，談了個多小時。這我才知道，湯公為了《儒藏》和北大新成立的「儒學研究院」，仍然忙得不可開交。他本來就蠻瘦弱，多年來一直為咳嗽、感冒、肺病等問題困擾，不時要跑到官廳水庫邊上去休養。我看他以耄耋高齡，還那麼勞形傷神，心中不期然泛起「毋乃太辛苦耶」的感覺，但不敢宣之於口。

翌年見湯公，談往事，談北大慶祝「哲學門」成立百周年的盛會，他都還顯得很興奮，很有味道。但2013年10月見面，則情況急轉直下。那時他診斷患了肝癌，腫瘤雖然經過放射治療而縮小，但已經轉移，樂先生則苦於糖尿病和膝蓋勞損，兩人都顯得十分焦慮，我也想不出多少話來安慰他們。2014年6月底有內蒙古之遊，回北京後立刻和越光夫婦趕到湯公家裏探望，但見他形容消瘦，面容憔悴，氣息柔弱，迥異平時神采，我們都大吃一驚。據說他是因為做了化療頗受摧殘，日前又扶病出席《儒藏》發布儀式，以是更形羸弱。但他仍然憂時憂國，殷殷以大局為問，臨行更題款贈書，令人泫然。我們出門後相對無語，果不其然，兩個月後就傳來噩耗了！回想起來，在那五六年間，相熟前輩、學者相繼辭世的，還有劉殿爵、葉曉青、陳學霖、何炳棣、朱維錚、高華、龐樸等七八人之多，真是「訪舊半為鬼」，聞訊驚心。一年後，我自己又經歷了一場大手術的熬煉。至此，方才真切體會，何謂諸行無常，何謂人生大限。

湯公家學淵源，受傳統薰染甚深，雖然在時代精神感召下一度信仰馬克思主義，文化大革命中更且捲入政治漩渦，改革開放後卻改弦易轍，致力於弘揚學術文化，以承上啟下、鏗而不捨的精神開辦中國文化書院，使它成為八九十年代民間文化運動的重要力量，為中國海內外學者的交流、溝通開闢渠道。學術上他編過先大人湯用彤教授的《隋唐佛教史稿》，自己深究魏晉玄學和道教，可謂秉承家學，出入佛老，但在生命最後十年悉力以赴的，卻終歸是儒學編纂大業。對游弋於中國文化汪洋大海中的學者如湯公來說，這真可謂萬變不離其宗了！如今湯公已矣，然而，他從容大度，弦歌不輟的講習流風未泯，他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猶在，以是，我們對中國文化的前途，還是充滿信心的。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